

（二〇一九年二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亡灵祭坛】	历史上的今天——1969年10月11日吴晗自杀	毕 儒
【往事非烟】	激情年代的激情故事	范雨臣
【史海钩沉】	北京知青插队下乡部署运作内情	陈徒手
【书刊评论】	知青将以什么样的形象留给后人？	定宜庄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亡灵祭坛】

历史上的今天——1969年10月11日吴晗自杀

• 毕 儒 •

吴晗，浙江义乌吴店苦竹塘人。曾官至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个相当聪明而且极具天赋的人。在学生时代就对明史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而且他在明史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发表过多篇很有份量的论文。但是，吴晗家境比较贫穷，他16岁中学毕业后就去当了一名光荣的小学教师，以补贴家用。

后来，吴晗到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求学。胡适当时在中国公学。胡适当时是反对蒋介石的。胡适后来去了北京大学。吴晗也跟着离开上海，去了北京。他本来想考北京大学的。但是，虽然他的文史和英语都是满分。但他的数学却是零分。北京大学没有录取他。他转考了没有零分限制的清华大学。

和胡适的师生关系以及和胡适之间来往的信件成了史绍宾打倒批臭踩扁吴晗的重要的证据之一。尽管吴晗和胡适通信时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史绍宾是一个听命于江女士的写作小组，意思就是史学界的哨兵。

吴晗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在历史系任助教。由于吴晗在明史研究方面学术成就，在北京大学的胡适动员他去北大任教。但当时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就是不肯放。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被二所著名的大学争抢，其水平确实不一般。

应该说1940年以前的吴晗还是埋头做学问的。但1940年以后，吴晗逐渐从一个历史学家变成了一个斗士。变成斗士后，吴晗在学术上再无建树。吴晗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1940年后，因为战乱，他母亲弟弟妹妹侄子七人，以及他老婆袁震姐妹三人全去昆明投奔了他。当时吴晗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吴晗一个人要养活全家老少十几口人。在物价飞涨的昆明确实不容易。当时的吴晗甚至穷得袁震发病时都无钱送她进医院。为了生活，吴晗当过二房东，甚至为了涨房租找借口赶走承租人。他变卖过心爱的藏书，他

甚至不得不跑去钓鱼以改善生活。穷则思变。吴晗开始发生改变。这一点体现在他讲课时开始愤世嫉俗。

吴晗发生变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老婆袁震。袁震是湖北老河口市人，才高貌美。袁震曾经做过董必武的学生。热衷政治。性格好斗。大革命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参加过五四运动。武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为无钱交学费，放弃了去当教员。1930年时她又考入清华。1934年和吴晗相识相爱，1939年时二人在昆明结婚。袁震有肺病、骨结核等多种疾病。袁震比吴晗大二岁。吴晗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尽管他全家特别是他母亲坚决反对他娶身患重病的袁震，但他坚持和袁震结了婚。袁震的姐姐也是地下党。袁震的妹妹后来则去了延安。娶了一个地下党做老婆，吴晗后面的变化就不难理解了。

1941年吴晗在老婆的带领下专门去重庆拜访过董必武。1943年中共派南方局负责人华岗、李文宜、周新民去昆明做统战工作。华岗化名林光候，打入云南大学做教授。李文宜因为和袁震是同乡，所以专门负责做吴晗的工作。在袁震的配合下，这工作很快就做通了。

抗战胜利后吴晗随校返回北京。1947年初，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在国共和谈破裂后离开北京时，叶剑英特地组织北京的民主人士座谈。叶剑英和吴晗都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叶剑英还送给吴晗一台收音机，让他收听中共方面的广播，配合中共方面的行动。吴晗安排人专门收听广播，并把收听的内容油印出来在民主人士中秘密分发。许多民主人士受到了吴晗的影响开始认同、接受并支持中共。

当时的吴晗家是中共的秘密联络点。也是北平中共地下党王冶秋，崔月犁等人召开秘密会议的地方。当王冶秋暴露身份后，吴晗想方设法把王冶秋送出了北京。后来，国民党军警开始怀疑吴晗，并准备抓捕吴晗。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面保护，坚决阻止国民党军警抓捕吴晗。梅贻琦后来安排吴晗离开了北京。吴晗几经展转进入了解放区。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吴晗随中共军队参加了入城仪式。吴晗作为军代表接管了北大和清华。1949年1月14日时，吴晗曾经写信给毛，要求入党。但因其1946年时曾经和一帮民主人士说过“内战国共双方都有责任”。“二党相持，人民受罪”之类的话。毛周二人对他的入党请求没有理会。后来，已经是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多次向北京市委主要领导请求入党。1957年3月时终于如愿。

导致吴晗一家悲剧的是剧本《海瑞罢官》。海瑞题材是吴晗应毛1959年4月的要求而写的。在毛的要求下，受宠若惊的明史专家吴晗一鼓作气写了《海瑞骂皇帝》，《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论海瑞》等。1959年9月时因马连良的要求吴晗将此系列改成了京剧。取名《海瑞罢官》。毛一开始对此剧是认可的。他看后很高兴。但是，几年之后，月亮的脸偷偷的在改变。

1965年11月11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他说吴晗“攻击毛主席”。1966年3月17日，毛也下了结论：吴晗是国民党，是坏人。

毛都下结论吴晗是坏人了，那还能错。于是，吴晗开始受到残酷揪斗。炎炎烈日下，他被绑着跪在瓦砾堆上暴晒。红卫兵们往他的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用皮带死命地抽他。

揪他的头发。他的头发都给揪光了。耳朵也被拧得几乎快要掉下来了。他的老婆，带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地下党袁震经常陪斗。那期间，吴晗的膝盖都跪烂了，全身上下皮开肉绽。鲜血顺着大腿往下流。但吴晗时刻把毛亲自签名后送给他的毛选捧在手上。揪斗结束后回到十几平方的小房子里反复诵读。他被定义成坏人后全家被赶到了一间又黑又破的小房子里。

揪斗了一年多，1968年3月吴晗被正式逮捕入狱。袁震则被送到郊区劳改队劳动改造。1969年春，袁震病得不能站立，被允许回家看病，当时11岁的养子吴彰和15岁的养女吴小彦把她用板车拉到了医院。但由于她是吴晗的老婆，本身又是右派。医院拒绝接受。第二天凌晨，袁震躺在医院大厅一角冰冷的水泥地上去世。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上门通知11岁的吴彰和15岁的吴小彦去看吴晗，姐弟二人很高兴。他们下楼时看到楼下停了一辆医院的车，来人告诉他们：你们的爸爸死了，尸体就在车上。吴晗留给二个孩子唯一纪念品就是一条在监狱里穿的血迹斑斑的裤子。

1973年吴晗19岁的养女吴小彦精神突然失常。后来被以“影响首长安全罪”被捕。在狱中，吴小彦的门牙都被打掉了，额头被打了一道口子一直无法愈合，一直流血不止。1976年9月23日，吴小彦跳楼自杀。吴彰后来去了美国。闭幕！

（2018·10·11南京）

□ 来源：《自由微信》网（freewechat.com）

~~~~~

## 【往事非烟】

### 激情年代的激情故事

• 范雨臣 •

#### ◇ 夜半枪声

“呼！呼！”两声枪响，子弹像是从耳边飞过。我急忙强力把她按下，用最大的气声嗓门令她“蹲下！快蹲下！”。

我们猫下身子，屏住呼吸，静候下一刻究竟会发生什么。一秒，两秒，直到几十秒，无任何动静。整个夜空仍像开枪前一样，死一般地寂静。

直到两分钟后，我才意识到我们竟然如此贴近，我的手还居然搭在她肩上，并闻到了她身上一种特别的气味……

这是1968年盛夏在科学馆顶楼的一幕。这天晚上我到顶楼找她谈话，劝她离开科学馆，远离武斗。谈到激动之处声音有些过大，招来老团打枪。

谈话就此中断了，但我们的关系却由此展开，发展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是拥有6名外孙（女）的姥爷和姥姥。她常因这6个孩子被她的同学戏称为“英雄姥姥”。

人们或许要说，像你们这样因躲避子弹紧靠一起，甚至比这更精彩的紧抱在一起的场景在电影里屡见不鲜，太落俗套。是的，这场景对外人不新鲜，但对我们来说，虽半个世纪过去，却一直十分鲜活。

值此文革50周年之际，我一直想写点回忆。但遇到了与电影《爱情的故事》主人公同样的问题，不知从哪儿讲起。片中主人公深沉地唱道：

Where do I begin?

.....

Where do I start?

.....

反复在耳边回响，我几次提笔又放下，文革太复杂、太沉重。影片中主人公最后从“With her first hello .....”开始讲起，对，学他，也从第一次说“你好！”开始讲。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66年大串联时的南京。她相貌平平，不善言谈。这种女生一般不会引起男生的注意。回校后偶在校园相遇，寒暄两句，各奔东西。我的回头率是零，不知她是多少。人们常把大串联说成是大串恋或大并联，不完全正确。串联时我们还没开始，彼此绝对都没那个意思。

#### ◇ 我是一个冒牌的老四

随着校文革的起伏跌宕，我们开始交换观点，谈话渐长。我们都来自工人家庭，有不少共同点。令我惊奇的是原来我们两家同住一条胡同，这极大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她说她们班还有一位同学也住这胡同。后来还有更惊奇的，毕业后到农场，在我们总共40多人的排里，居然还有两位清华的也来自我们这条胡同。我家是在我初三那年搬来的，这里没我的发小。

学校里冒出了团、四两派，我和她同是老四，按说应有共同语言，实际上完全不是。我只是个挂牌的老四，内心一直是个铁杆老团。别误会，我不是打入老四的老团卧底。我虽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从未做过伤害老四的事，也从未做过愉悦老团的事。为什么？下边详谈。

她没有强烈入党的愿望，这与我相近。实际上我比她极端，一点入党愿望也没有，甚至曾一度发誓这辈子永不入党。今天我说这话绝非是想标明当年我多么“英雄”，而是想告诉大家当年我多么愚蠢。

我父母都是文盲，父亲耳朵全聋，母亲是从未工作过的家庭妇女。家庭里没有党员、亲属中也极少，没人指导我该如何认知社会。如果我有足够的智商，我会自醒自悟，看透社会，去积极争取入党，可惜我智力平平。与我贴近的党员、或者说对我起示范作用的党员就是身边的同学。他们个个说话非常谨慎规范，行为非常标准，不愧是楷模。但他们的一言一行、甚至一个简单的眼神所流露出的内心世界，绝逃不过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学的眼睛。我曾有段时间发誓，若入党，绝不入清华的共产党，毕业后去入社会上的共产党。等毕业后到社会上一看，咳！社会上的共产党远不及清华的共产党。

校方曾要求毕业班的党员应达40%。我是7字班，66年离毕业还有一年，班内党员已超过40%。其实在校入党很容易，只要认真表现一年或稍长（不可叫伪装）就可入上。当然一定要贴近党组织中的关键人物。如何解读“贴近”花样繁多，此不赘述。

那年头不入党有压力，甚至受歧视。为摆脱歧视，有时也想入党。但入党后若不当官，只能当老黄牛。掂量自己的能力，远不是当官的料。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非党员不再过多地受到排挤、歧视，于是彻底打消了入党念头。当今已无人再为共产主义理想去入党，这与当年确曾有许多人为追求理想去入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后话。

◇ 她不该是老四

我不理解她为什么会是老四。她说团派里净是小偷流氓，痞子太多。若仔细观察一下，团派里小偷好像确实比四派多一些。如再仔细观察，所谓小偷大多是顺点公家东西回家，没听说他们偷私人物品。与此相反，我们年级有位稍有点名气的老四，刚入学时居然偷同学饭票，事后不久就入党了。而那位被偷者尽管品学兼优，直到毕业仍没入上。其实往家里顺东西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特色。在前苏联，许多城里人都在郊区或乡间建别墅，所有建筑材料几乎全是从公家顺的，很少有人自掏腰包。当然顺公家东西绝对错误，在中国只有蠢人才这么干。聪明人怎么干？当然是入党当官。我继续对她说，就以你父亲为例，同是与你父亲50年一起进厂的工人，当官的早就拿上7—8级工资了，而你父亲仍在4级这儿趴着。少数因当官的受益者与顺公家东西回家的痞子没有本质区别，一个光明正大地“拿”，一个躲躲闪闪地偷；一个精明，一个愚蠢。面对社会财富，人类怎么分配？我们从小被灌输说资本主义是按资本分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其实纵观人类历史，从古至今只有一个分配原则，即按人的智商分配。你有多高的智商，就享多大的福；你有多低的智商、就受多大的苦。此话绝非是把广大工农群众都打成低智商，但在一个社会、特别是正常的社会里，勿容置疑，成功人士的智商普遍高于工农。何谓成功人士？有人认为是科学家，有人认为是大款大腕，即使在农村，一个小小的村长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相比，不乏也可算个成功人士。

对于没东西可往家顺的教师来说，情况也如此。大四那年我班突然来了位小课老师，她就是系总支书记李德鲁。我不理解，我们总共才30人的小班已有好几位流体力学老师，根本就不需要一位不讲课，不改作业，不辅导，却经常和我们泡在一起的老师。奇怪的是她老缠住我，问这问那。起初我以为是质疑，后来惊奇地发现她居然什么都不懂，反叫我给她讲解。直到文革才获知，原来系里打算派她去伦敦念硕士。笑话，一个连起码数学基础都一塌糊涂的人念什么硕士？班里比我学习好的同学有许多，为什么偏选中我？原因很简单，我是班里唯一的一位白丁，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通天”能力差，她的老底不易外泄。即使泄了，影响也不大。

再说这流氓，没听说有人统计过老团的流氓比老四多。文革中盛传团委书记张慕津曾乔装女生，混入女浴室。此说沸沸扬扬，不知真伪。至今未听有人辟谣。张慕津曾参加过三青团，在共产党内有一大批像他这样的人，没有真正的主义追求，只有随风转舵，最大利益的追求。

所有这些我反复对她讲，仍改变不了她。我开始琢磨，是否应把我独特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也许那样会改变她。

一天，忽然从科学馆广播声中传来了她那特有的“小男孩”般的嗓音。怎么搞的，她居然参加科学馆武斗了？此时武斗已升级到热兵器，开始打枪。她怎么能这样？我必须劝她离开！我不顾一切玩命跑到科学馆，就有了本文开头的谈话。

我告诉她，人称叶志江是万字号学生，其实我比叶志江还叶志江。叶只是万里挑一，我是几万里挑一，我“胜”过他好几倍。在清华几万名学生中，大概无人有我这般经历……

#### ◇ 档案风波

大五那年下乡四清。就在颐和园后边的肖家河，离校很近。那里的贫下中农非常复杂，许多人是临近49年时，在城里混不下去的杂民跑到郊区租地种菜，暂且度日。共军大兵一到，就都成了贫雇农。其中一人曾与清华的毕树棠有过联系。毕树棠这人我知道，在旧清华也算个名人。在日伪时期，他曾是清华留守班成员。我立即来了情绪，特想见见这位老先生，于是决定到清华外调。

这次外调纯粹是为了好玩儿。我很快开好介绍信。开信的程序是先在我们大队工作组开个申请单，填上×××（我本人）到×××（外调单位）去调查×××（人），然后再到公社工作队换一张正式的介绍信。这一天是1966年4月5日，星期二，阴历十五。这本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却成为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天。

来到土建系（毕在该系），但系里说学校有统一的接待站，系里不接待。统一的接待站位于新水利馆西门门厅上二楼的一个很大的教室。进门一看，哇！从北到南摆满了4行小课桌，许多人趴在桌上看资料，全然不是我想象中的接待站模样。门后紧靠东墙有一很大很长的接待台，台外围着2—3层手持介绍信或文件袋的到访者，台内3—4名工作人员满头大汗，应接不暇。

等了20多分钟，终于轮到我把介绍信递上。那人立即问“要不要先看档案？”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令我不知所措。我本是来面谈的，看什么档案？还没等我回答，那人便说“行，先看看档案吧！”然后他又问“哪个系的？”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数力系的”。从61年入学，直到66年4月的这近1500个日日夜夜，脑子里形成顽固的条件反射就是每逢听到有人问“哪个系的？”回答都是“数力系”。但这次错了，直到那人出门10多分钟后，我才醒悟过来。那人肯定要白跑一趟。又过了10分钟，那人居然把档案取来了。在清华几万名学生和教工中，在错误的提示下，仅20来分钟就把档案取来，神了。

我找了个座位，翻开档案一看，立马懵了。档案上的文字犹如一发发子弹，直射眼底，眼冒金花，原来这是我自己的档案！我立即闭上眼睛不敢看。我知道偷看自己档案是严重的犯错。我不敢怠慢，立即把档案收好，回到前台，心里嘣嘣直跳。

前台外人很多，等了好几分钟也没能把档案递上。此时我突然悟到，如果有人获知我现在的状况，没法洗清说我没看。妈的，一不做，二不休，看！

翻开档案，紧张的心情渐渐变成愉悦。看到前些年填写的表格，十分亲切。重读前些年的思想汇报，幼稚可笑，真不该写那些东西。

再往下翻，顿觉似晴天霹雳突然在眼前爆裂。在一张稍小于A4页面的纸上端端正正地写道“其兄是右派，至今未向组织交代……”

荒唐，实在是荒唐，怎么会有这种事？细看笔迹，没错，就是班内 A 同学干的。我不明白，我到底怎么得罪他了？竟下如此狠手！再继续看，更惊奇的是班里还有好几位检举我，上纲上线都非常高。

我彻底懵了，实在看不下去了。头伏桌面，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直到有人敲桌我才抬头，人家要关门了。

坐在荷花池北岸的长椅上，反复回忆我与这些同学，特别是与 A 的相处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刚入学时，A 是班内唯一的一名党员，可以翻阅每人的档案。很多同学都托他查看自己高考成绩，我大概是班里唯一一名宁可不问自己成绩，也不求他的人。A 来自河北农村，给人最初的印象是老练、早熟。早熟似乎也正常，他比我们大好几岁。大家都很敬重他，敬重的成分里除了觉得他政治觉悟高以外，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今后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就握在他的手里，哪个不想入党入团？但偏偏出了个例外，我不但不想入党，连团都不想入。我虽没向他（或曰组织）靠拢，但绝对没得罪过他，对他一直是“敬而远之”。难道“远之”会招祸？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没闹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同样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检举我。平日关系都相当不错，怎么会背后下手，我居然对此浑然无察觉。看来我的智商确实有问题。我这人有个毛病，每逢碰到麻烦，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智商有问题。但仔细一想似也正常，那年头那个不想入团入党，不要求进步？要求进步一要克己，二要严批资产阶级思想。批得越狠，越表明上进。但如何寻找批判对象是个问题。对己不可批得太狠，否则闹不好会把自己弄成个“反动学生”。我系 8 字班就有两位由于在九评学习中对私字一闪念挖得太狠，结果双双被打成反动学生，其中一位在清华掏了 17 年厕所。几年前他在他班级网页上说“我掏遍了清华所有厕所，清华学生无一人有我这般经历。”太惨了！因此要想狠批，只能批别人。但平日大家上课，吃饭，睡觉，在班内很难找到评判对象。我作为班内唯一不求上进的白丁，自然就沦为众人之的。造成这一局面，客观地讲不能都怪罪这些同学。我相信班里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像我这样遭多人举报。我之所以沦为众人之的，全是平日生活大大咧咧，不求上进造成的。总之，我的智商有问题。

我深陷恐惧，有些人的检举似匕首，直插心底。如我被法办，处决，不如现在就自杀。自杀落下的罪名是自绝于人民，不是反革命。现在只要跳入眼前的池中就可死，但池水太浅，我会游泳，怎么个死法？几天前我曾回家，我对母亲说我们可能提前毕业，母亲当时泛起的笑容立即又浮现在眼前。如我死，或许能解脱恐惧，却把母亲推入无底深渊。不，我不能死。人家把刀子已架到我脖子上，等待时机置我于死地。我却夺过这刀子，往自己脖子上抹。我虽智商不高，但还不至于蠢到这个份儿上。不，我要活，活着就是胜利。

坐在荷花池北岸长椅上望着月亮在树梢上渐渐向西爬行，直到东方渐白。在回肖家河的路上，尽管我已决定不自杀，但总有想钻入奔驰的汽车轮下的冲动。为防意外，我绕入圆明园，走小路。

#### ◇ 核对

回到工作队后，我立即质问同班的 B。他和我同在一个小队，同睡一个炕上，在档案里有他的检举。我首选 B 进行核对是因为在所有的检举中 B 的检举份量最轻，同时我还想借此核对一下班里其他同学的检举是否真出于他们本人，还是有人假借他们的名义伪造的。我质问 B：“你为什么诬陷我，说我说‘刚果总统马桑巴代巴长得像头猪’？还把此话上纲到攻击党的外交路线？”B 听后，吃惊地睁大双眼，足足瞪了我 7—8 秒，他大概不明白他的密

告怎么会被我获知。突然，他把脖子一拧，咬牙切齿地说：“你说了，就是你说了！”真是可恶之极，无耻，无赖！事后我反复琢磨B这人，渐渐醒悟到还有一件一直令我深感蹊跷的事很可能也与他有关。工作队长曾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一工作队员形态不佳，会后我曾问B，队长说的那名工作队员是谁，B只是微微一笑，没回答。后经我认真核查，队长说的居然就是我，正是由B举报的。B向工作队长密告说：“贫下中农说小范的走路姿势像刚刚逛完窑子。”我不明白，即使贫下中农真说过这话，我和他同睡一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而是偷偷向上汇报？

B是从6字班蹲下来的，学习很差，到我们班后完全丧失了学习信心。每逢上大课就进城逃学，最后落了个留校察看处分。处分后倒是不逃学了，但考试成绩仍是一塌糊涂，按正常程序本应勒令退学。恰逢65年停课，下乡四清，真是时来运转，如鱼得水。到了不再上课的农村，他如脱缰野马，尽情地又跳又唱（他曾是校合唱队成员，后因处分，被除名）。最后工作队长准备发展他入党，有人告知队长B至今仍背有处分。队长非常尴尬被动，竟把气撒向我，训斥我为什么不及早告诉他。真是滑稽可笑，B靠检举我差点入党，我出于保护他，未外泄他的丑闻，反遭举报，还遭训斥。

#### ◇ 班内“团”、“四”两派由来已久

我班四清分两拨儿，一拨儿在上庄，一拨儿在肖家河。两拨人数大体相当。上庄帮都是党员和准备发展入党的，肖家河帮则是班内一群“臭鱼烂虾”。臭鱼烂虾一词当然不是上庄帮那些“人上人”对我们的称呼，而是我们的自嘲自谑。上庄帮认为我们思想落后，我们认为他们不真诚。

班内两派文革前早已形成，且十分对立。这次四清只不过人为地划分开来。尽管后来学校文革起伏跌宕，不断分派，但班里两派一直同步跟进，阵容从未错乱。最后上庄帮基本上是老四，肖家河帮全是老团。但也有例外，我本是铁杆老团，却随了414。

文革前每个高班的情况大体相似，均已形成两派。为更具一般性，对文革前的班内两派，下面采用杨继绳和孙怒涛的“优质生”与“劣质生”的提法。尽管这一提法不够科学公正，但一时又很难找到更确切的提法。优质生大多是党员干部，他们对社会、人生的认知与理解明显领先劣质生好几个周相，其人生哲学非常实用。精明的素质使他们能坚守节操，不会因贪图眼前蝇头小利去冒险犯错误。劣质生则刚好相反，他们拒绝说假话，自命清高，自命出泥不染。其人生哲学不但不实用，有些人还拒绝实用。由于不开化，常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的帽子。劣质生虽被称为劣质，但学习成绩并不示弱，许多人超过优质生。

66年5月两拨人陆续从四清返校，校内已大乱。长期感到压抑的劣质生们终于有了说话权，仿照四清，同时也是仿照几乎所有从四清返校的高班，把班干部通通都轰上“楼”，指控他们忠实执行了修正主义。干部们不敢怠慢，立即“深刻”检讨，同时又深感委屈。他们觉得自己一直忠心跟党走，怎么成了修正主义？其实指控只是托词，实际上劣质生们是在发泄长期压在心中的不满。长期以来以党员干部为核心的优质生们总是要人端正学习态度，斗私批修，对劣质生们的一些“不良倾向”上纲上线。最令人不悦的是有些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挖掘自己灵魂深处的丑陋。最令人心烦的是那些积极争取入党的人，他们总是在周围寻找批判对象，以凸显自己积极上进，入党花招无奇不有。我的下铺C为了入党，在床头建了一个“灶台”，中间是毛主席像，左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右联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横批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C为了凸显自己进步，总是找劣质生们的岔儿，上纲上线。其实C所做的一切均源自班干部



A 的思想，C 创造性地发挥，达到极致。C 所使出的这套入党招法，对劣质生来说并非由于智商不够使不出来，只是实在不愿去使。

当然，对党员不可一概而论。我班有位非常优秀的党员，入党光明磊落，多年来处处做表率，从未诬陷过他人。他智商高，曾是全校 7 字班 8 名因材施教生之一；情商也高，毕业后没多久就坐上了正部级，成为歼 10 飞机的总负责人。

从四清返校后，班里劣质生们成立了批判优质生小组。一些小组骨干说起某些优质生来，气愤得吹胡子瞪眼（刚从四清返校，还没来得及刮胡子）。我不知道这气愤之后都隐藏怎样令人伤心的故事，但肯定他们绝没像我这样，因看到自己档案而引出的一系列最刻骨铭心的伤痛。直到毕业，两拨人仍十分对立。在毕业离校时，那位后来的歼 10 飞机负责人曾说过的一句话：“同学 7 年，最后落下的只是一个‘认识’”，至今仍常在耳边回响。

在批判优质生之初，我作为一名典型的劣质生，出自本能，立即投入批判，但立刻意识到这很危险。我的档案本已十分严重，再参加批判，会激怒档案操纵者继续往档案里添加更严重的诬陷材料。恰在这时从父亲工厂传来一名造反者被打死的消息。之前，该厂政工组组长曾放言说这名造反者是一名证据确凿的反革命。被挑逗起来的保守派群起打死了这名造反者。其实所谓证据确凿就是这名造反者在听报告时，在纸片上随手写的几个字。纸片对着阳光一照，正反面文字摞在一起，就成了反动标语。纸条遭举报后，收入档案。

#### ◇ 我投降了

我越发感到问题严重。经考虑再三，退出了批判。这立即引来劣质生们的唾骂。我虽游离出来，但自尊心告诫我，不可低三下四地去入人家优质生团伙。历史经验还告诉我，如某人从背后哪怕只伤害你一次，此人终生看不起。此时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媾和。我的处境很像从重庆逃出，在河内遇刺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中日的伤亡比是 9：1，后期是 3：1。以汪为代表的一批人为停止日军对华屠杀，采最最下策，与日方媾和，自己甘愿背汉奸罪名。说媾和是好听，实际上是投降，出卖灵魂的投降。

班里优质生们最后都成了老四，我这名投降者也就随了老四。我随老四还有一个小小的诱因。我在肖家河四清时，由于离清华很近，常有清华低年级学生到我们这里了解农村阶级斗争，我们总是认真讲解。一次回校，在阶梯教室北墙上发现有“×××这是怎么回事？”的大字报（也可能是“×××这是为什么？”，记不清了，下同）。不禁大吃一惊。大字报的中心意思是怀疑我们工作组勾结地富反坏右，对抗四清。大字报落款人较多，只记住了其中的一个“蒯”字。工作组进校后，在阶梯教室的北墙同样位置又出现了“×××这是怎么回事？”的大字报，落款人中又现出了“蒯”字。于是对“蒯”很不感冒，促成我随了 4 1 4。

#### ◇ 黑色浪漫

以上就是我在科学馆与她谈话的主要内容，我不知能否改变她。我最后对她说，所谓团、四之争实质上是背后两大利益集团之争。四派的核心是十七年来一直受益的党员干部、以及决心走这条受益之路的人。团派的核心是十七年来一直受压，未受益，极力想翻身的人。不要听信他们口头上的政治主张多么正确，多么冠冕堂皇，不要去判断谁更符合毛泽东思想，如今这思想早已沦为双方进攻和防御的武器。你认为 4 1 4 思潮必胜吗？或许它真会必胜，但前提是共产党必须当政。也就是只要共产党当政，4 1 4 思潮肯定必胜。毛主席不赞成 4 1 4 思潮必胜，那是因为被他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还未彻底全败。等毛全胜之后，肯

定要改变态度。他绝不会认为在他光辉思想指导下的17年是黑线主导，往自己脸上抹黑。为使自已继续行使权力，或曰这个政权继续维持下去，到头来还得依靠17年来培育出的广大党员干部。你等着瞧，日后肯定会在四派内涌现出一批共产党大佬，而不是在团派内。这些大佬秧子现在在干什么？他们正眯在后边，纵容你们去玩命（此语实乃当时所言，绝非事后诸葛亮之添加）。我继续对她说，如果你将来准备走党员干部这条受益之路，你现在尽可为414去摇旗呐喊，但没必要去卖命。你们低年级班内两派还未形成，我相信你们的激情确实来自追求主义真的冲动，只可惜你们的激情一直在被人利用。当年国共厮杀，双方的旗帜多么迷人。一方要建立共产主义天堂，一方要建立民族、民生、民权的繁荣中国。双方死了那么多人，都在炫耀自己歼敌××万。实际上死的几乎都是贫下中农，因双方在前线厮杀的士兵几乎都来自贫下中农。你现在真地甘愿作为一名“贫下中农”去为414卖命？

我知道我说这些话非常危险，如果她去告发，我肯定被打成反革命。但我相信她不会告发。我的话实际上是对她内心深处的一次极具冒险的试探。人世间男男女女，男方最初向女方试探，表白的方式五花八门。眼下时髦的是拿朵玫瑰花向女方下跪，或在女方楼下摆爱心烛光……但是在黑暗中伴着枪声，冒险说反革命的话，用这种方式表白大概十分稀有。浪漫吗？是否浪漫取决于现在的生存状态，所有的回忆都是如此。如果现在的生存条件比过去好，会觉得过去的苦难是磨练，是上进的垫脚石，甚至认为磨难是必要的。如果现在的生存条件不好，甚至更坏，过去的苦难不堪回首。

两年后我们结婚，作为结婚礼物共收到49枚主席像章、44幅主席像、20本语录、5套毛选。咳！无耐的“红色”浪漫。

#### ◇ 反思

有共产体制就会有无端的检举，告密和入档。东欧转型后，多国都曾闹过档案风波，德国最厉害，震惊了世界。在前东德有1/3的人、约500多万有特别档案。东西德合并之后，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特别档案自然就没有了意义，合并后的德国议会决定销毁。但档案的当事人不干，他们坚持要看自己的档案。后经德国议会的反复辩论，最后决定公开。这一公开可不得了，全国立即沸腾。人们惊奇地发现一些检举告密者居然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有的是自己最敬仰的老师，有的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有一位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发现长期向党组织告密的居然是自己的丈夫！尽管丈夫矢口否认，但检举的事实非他莫属，已有两个孩子的她不得不痛苦地离婚。还有一大批双重人格的告密者，他们一边批评共产体制，同时又检举别人反共产体制。后来在罗马尼亚等国都闹过档案风波。

同在共产体制下，为什么只有中国闹文革？这不能不说与我们的民族性格有关。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有怎样的性格？说起优点来，可以滔滔不绝，没有任何顾虑。但说起缺点来（我不敢用胡适、鲁迅等人的“弊端”、“劣根”等词）就要格外小心了，弄不好要背个汉奸罪名。黑格尔曾说“中国无哲学”，中国无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兵法社会，民族崇尚谋略家。许多人在外侵者面前是羊，在同胞面前是狼。季羨林曾把文革的源头直接追思到中国人的国民性，衔接上了鲁迅，认为国民性比政治原因更深刻。

在中国近代，各种救国大略几乎都试验过了。康梁变法失败了，据说是因为袁世凯告密，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出“袁世凯”？国民党试验的资本主义失败了。为什么当今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种主义，人家能成功？我们的人民公社垮了，为什么以色列的共产公社基布兹能成功？我们还需要试验更多的主义和思想才能证明我们的民族性格没问题吗？够了！我来以色列20多年，看看人家的民族性格，国家搞不好那才叫怪哪！再看看我们的民族性格，中国不出文化大革命那才叫怪哪！

马克思创建的共产学说在西欧行不通，却在俄国与中国落地生根，绝非偶然。我出来这么多年，在所接触的民族中，俄国人的民族性格很像我们。有些传染病，像肝炎、肺结核等病专找体质弱的人，一旦染上很难治愈，弄不好变成慢性，过去曾是不治之症。有一种主义也是专找穷国落脚，一旦染上，同样也很难治愈。但并非所有的穷国都染上，这取决于所在国的民族性格。

让我们认真回忆一下，文革初期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下层的人都在干什么，不都是跟着积极掺和甚至起哄吗？许多人觉得这回机会可来了，都想利用这次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可到头来，目的非但没达到，反而失去更多，于是又都惊呼自己受骗上当了。毛发动文革有他自己的目的——打倒刘少奇及其同伙。但民间却几乎把所有的基层支部书记都打成了走资派，起码靠边站。许多专家都说，所谓文革实际上是两个文革的叠加。一个是上层的权斗，一个是下层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主要是干群矛盾）的总爆发。

我们班总共30来人，人数虽少，却俨同一小社会。班里有我这样一直被人愚弄的低智商者，也有把毛泽东学到极致的高智商者。他们不但活学活用老人家的思想，连老人家的为人也都学得驾轻就熟：“谁不敬奉我，谁就是反对我。谁反对我，就置谁于死地。”他们认定每人绝不会看到自己的档案，于是就肆无忌惮地往别人档案里塞东西。他们绝对没想过有朝一日社会转型后会公布档案。我比东德人幸运，超前他们1/4个世纪彻底了解到社会的复杂、人性之恶。我比东德人不幸，没能像他们那样扬眉吐气。

鲁迅曾这样评价《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的评断不禁令人拍手叫绝，我很想也像鲁迅那样，犀利地分析出不同人群对文革的不同看法，可惜我没有他那样的功力。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不能从大视野分析文革，只能谈谈一个在文革中从未上台发言，从未参加任何行动，只写过一张不温不火、不痛不痒大字报的我是怎样在文革中走过来的。我的观点肯定片面，甚至错误。如果每个从文革走过来的人都谈谈自己的“片面”，凑在一起就是全面。

本文提到的一些同学看到本文后，我相信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不会再用文革揭老底的办法指责我曾有这错或那错，即便把我说成小偷流氓也无所谓。因即使我真是小偷流氓，也不能构成诬陷我的理由。正如即使雷洋嫖娼了，也不能构成死罪一样。

常常在电视上看到茫茫的人流在大街上涌动。如果把镜头拉近，再拉近些，立即一个个陌生、无表情的脸庞在屏幕上晃动，不知他们是谁，去干嘛，不知他们在想什么……如果翻开1966—1968清华的录像，在茫茫人流中或许会发现有个中等个儿、偏瘦的男生随波逐流，身后还常跟着一名女生。把镜头拉近，再拉近些，这个戴眼镜，其貌不扬的男生面无表情，东张西望……他是谁？他在想什么？让我告诉您，他所想的就是本篇所陈述的，他就是我，身后的女生就是她。

（作者简介：范雨臣，男，1943年出生于北京，1961年入清华大学数力系，1968年奔赴安徽丹阳湖农场，1970年入中科院自动化所，1979年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1992年入以色列海法理工大学，直至退休。）

◇ 讨论帖选登

▲ 孙毓星：@范雨臣？好文好故事，情节跌宕妙语连珠如天桥说书般，但讲的却是真情实事和深思灼见。

▲ 侯国屏：@范雨臣？你的文章入木三分，细致刻画了当年那个环境。是不是过分？说不清。与具体领导有关，各人感觉也不同。当所有人都积极靠拢组织，要争取在毕业前入党的氛围中，背后可怕的小动作少不了。低班好些，但这种苗头也出现了。反正我感觉到了。

▲ 陈长坤：雨臣兄的“激情年代的激情故事”写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真实经历与体会，文字流畅，感情真挚，读来感到亲切。不过，我对于文中所说的一个班上的同学为了追求进步，竟然还会相互告密，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仍然感到震惊。也许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也许我们低年级与高年级也有所不同，起码在我们班上我还看不到同学之间有告密者。诚然我们当时受到的党化教育很多，大多数同学都要求进步，积极靠拢党的组织，但似乎还没有听说有人告密的。在团、四尖锐对立的时候，我班也分成为两派，但两派同学之间仍然友好相处。

▲ 张雪梅：人活在世上，必须“义”字当头，最可恶那些特务，叛徒，小人！但是大千世界就有这种人？！

▲ 张比：文革前清华的政治生态很复杂。学生中，通过九评学习，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血统论已隐隐在起作用。追求“进步”者与思想“落后”者的矛盾逐步形成。这也给文革中人群撕裂以很大影响。

▲ 胡伯骏：如果说文革前的政治生态，是在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教育灌输下，有的人真诚地接受，有的人不知不觉中被接受，也有少数打折扣地接受。由此产生各人的政治表现不同。清华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就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教育背景下的生动体现。我所在班六年来，辅导员都是本班的党员担任，指导班团支部的思想工作，就是经常找同学谈心，倾听思想汇报。晚上熄灯铃响后，他们（干部）还会在走廊或专设的一室内议论，我有幸与班辅导员对面上铺，经常看到他在电筒下记录着写些东西。在时政学习中，有所争的大多是一些政治术语的理解不同。而且大多是联系实际的自我检讨，譬如想当居里夫人，五十年后的自画像（科学家）……，走白专道路。最最厉害的就应是所谓的九评学习，清理思想，本人就此对自己的家庭三代作过深入的阶级分析，以此作为思想汇报，表明向党靠拢。

▲ 吴学民：我是九字班的，也非机要系。为了入党，都需要做些什么事，前面很多同学说的都是事实。范学长对此更是刻骨铭心。我班也是类似的。因此还没有入的或不打算入的对入党这件事多少都有看法。在文革中自然分属不同的派别。我班加入四派的基本上都是党员，所以大多数都是团派。可能越到高年级越明显，九字班已初见端倪了。不过我班两派同学之间还没有伤感情，毕业时在毛像前合影，毕业后也多次聚会。

▲ 苏鹏声：我是电机系00字班的，一入学就开始进行思想教育，参观了清华“反右”的展览，政治课教师和政治辅导员反复到班上开展活动。但是，我们毕竟没有赶上“九评”的学习，到学校时间短，不像高年级同学，受清华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影响深。我们年级5个班，文革前只发展了两个党员。我们班也没有发现有同学之间互相“告密”的现象。虽然文革中班上也分为两派，两派同学之间没有结怨，直到现在，我们之间关系都很好。

▲ 谢佑文：文革刚开始后不久，学校里许多同学开始贴揭发蒋南翔修正路线的大字报。有同学邀我一起签名，我不敢签，只好每天出去看大字报，很晚回宿舍，钻入帐子睡觉。我睡

上铺常常看到下铺的同学汤 xx（已去世）拿一小本记录，我当时视力很好，能看到他记录的材料。内容都是班上某人邀谁写了什么大字报，贴在哪里，签字人名单……。

▲ 王铁藩：说到清华的政治生态，政治辅导员是不可或缺的。

清华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于 1953 年 2 月，开我国高校政治辅导员之滥觞，堪称清华的专利。

我的第一位政治辅导员是郑，她比我们高两个年级，学房屋结构的。辅导员虽不是老师，但由于冠有“政治”的定语，因此难免给人以“肃然”、“岸然”的感觉。而她却随和、平易。

作为政治辅导员，她有着很强的政治敏感性。记得有一次谈完话，我仰望着缀满星辰的夜空，感叹道，斗转星移，世事茫茫，什么是真理谬误，哪里有是非曲直？我的话音未落，她已经厉声说道：你在胡说什么！借着宿舍泻出的灯光，我看见她的眼神变得异乎寻常的犀利，我真有些惶恐了。

那晚她很教育了我一阵，有理论的，比如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也有实践的，比如我党的光荣正确伟大（那时候似乎还不时兴这样的词，但意思不差）。她也很善于运用榜样的力量，讲历史豪杰、苏联英雄，更多的是讲周边那些杰出的学子，如无线电系品学兼优的茅于海，讲他如何来自江南水乡而不习惯北国的干旱，讲他如何心存报国之志而乐此不疲于全面发展的追求。

就我个人感受而言，政治辅导员相对于被他们辅导的同学，年龄稍长，已经习惯于大学的学习方式，政治上比较成熟，生活上也有了多一些的阅历，站在“师兄（姐）”的立场上，从各方面对后来者予以引导、帮助、督促等等，无疑对双方的成长，都是多有裨益的。但是，政治辅导员毕竟与被他们辅导的学生有着大体相仿的年龄、经历、知识和素养，赋予他们太多太浓的政治性任务就有些超其所能了。

▲ 陈中平：范雨臣的文章，有较强的故事性，接“地气”，使人愿意读下去。

“档案风波”完全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四清的调查人，以外单位的名义到自己的单位“外调”，本身就极为罕见。清华是一个大单位，接待员不认得他，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处于“麻木”状态。由于范“张冠李戴”报错了系名，接待员找不到调查对象，居然把调查人的档案拿出来“移花接木”，简直充满了戏剧性！

档案里的内容，可就没有那么轻松有趣了。一份份小题大做甚至无中生有的“检举揭发”塞了进来，如同当今无所不在的一个个“探头”，却又变形扭曲，蒙上丑陋色彩，这样的陷脏泼污，足以左右一个同学后半生的命运，令人不寒而栗。

告密是中国由来的传统，这是集权国家的特色，极权时代尤甚。我们年级四个同学一起分到核试验基地，一位将校子弟出身的党员，写了两位同学的揭发材料，有一人竟罗列了 49 条！每一条都够批斗甚至打倒，连基地的领导都看不过去。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可以把人性扭曲到何等程度！

文革中范雨臣班的分派，仿佛是早已形成的。但社会现象不像科学定律那样分明，把自己的行为比喻成汪精卫，似乎说过了头。

“羡慕嫉妒恨”是中国人的基本丑陋本色，在文革或其它运动中，常常以剧烈粗暴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物欲横流的当代，又会有各种形形色色的表现，范文对此有所触及，只是没有深入展开。

雨臣兄在这篇散文中的朴实叙述，所蕴含的道理值得细细品味。

▲ 梁颂辉：我班（汽 8，两个小班）“差质生”多于“优质生”，在团、四两派结构上也有反映。我班四派约十人（但却多数出身于职员、中农），两头（党员、出身好的和出身差的）却大多是团派，约四十人，不过大多是逍遥派。按“优质生”“差质生”论，宏观上符合，微观上却又不符合。

▲ 林刚：范雨臣是七字班的吧，我和孙怒涛是六字班的，确实高班与低班在许多问题上感受不同，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确实黑暗面很重。回顾一下我们当时的心路历程、思想变化，要比争论文革中一些具体事件的是非更有意义，更加鲜活，激发出的是心灵深处的共鸣，比仅按学术似地来讨论文革要好。

▲ 钱久业：@林刚 看来机密系确实比普通系厉害多了，还有高班的积累比低班多得多，怪不得孙怒涛会如此评价团、四之分实质为优质、劣质之分。

然而低班还处于混沌期，特别是非机要系相对要单纯得多，好像这方面的区分并不明显，——因此很难接受赞同老孙的优劣生的论点，感受与事实不符。

▲ 吴权：谈一点感想。

范兄的文章别开生面，从激情年代激情故事入手，细致地记述，描写了那个时代国家底层的政治生态，生动具体，娓娓道来，令人印象深刻。那是一个所谓政治挂帅的时代，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时代，林彪所说的政治绞肉机时代。今天，所有我们这些过来人看过这篇文章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的日子。那是怎样的日子呀，占据优势地位，追求利益的人整天狗苟蝇营，总是想着如何整人；居于劣势，追逐利益无望的人整天提心吊胆，压力山大，害怕被整。整个社会除了不懂事的孩童，从最高领导人到平民百姓，都没有安全感，人人自危，到处弥漫着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今天回想起来，心中仍不免涌起阵阵隐痛。这种情境有时与儿孙，学生辈说起来，很难说明白，他们也很难想象和理解。我想，要是他们能看到范兄此文，一定会增加不少对那个时代的感性认知。因此，我以为此文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 孙怒涛：范雨臣的文章里提到了他们班的优质生、差质生。

优质生、差质生的概念是我为了分析团、四分派的原因在我的回忆录《良知的拷问》中首先提出的。

当年，并没有优质生、差质生一说。为了分析方便，我把政治思想觉悟高、出身红五类的学生统称优质生，党员、政治辅导员、学生干部是优质生中的佼佼者。与党离心离德、政治表现差、出身不好的学生统称为差质生，反动学生、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不满言行者则是差质生中的典型。

在当年，优秀的优质生是大家学习的模范，追求的目标，而差质生是落后的，被人“帮助”的。今天，如何评价当年的优质生、差质生？标准不同，各人的看法也很不同。优质生不见得一定优，差质生不见得一定差，这是为历史证明了的。我用这两个名词，不含褒贬，只是对两类不同学生的称谓而已。

一、学生中有没有优质生、差质生？

在我写回忆录的时候，我只能以我的班级为样本说明优质生、差质生是存在的。这几年来，在校友社区、微信群，对优质生、差质生问题经过多次讨论。许多校友以各自的班级为例，发表各自的看法。总结一下，大致如下：

- 1、就全校而言，优质生、差质生的存在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 2、高年级中这一现象比低年级要显著、突出得多。
- 3、有少数班级没有明显的差质生。

高低班级的这一差别，主要是因为，对于低班，通过高考，中学里的差质生被淘汰下去了，刚进校的基本都是中学里的优质生，但党员、辅导员也不多。因入学才一二年，经历的政治运动相对少，分化出来的差质生也不多。所以全班同学的表现都差不多。而高班，特别是大学五六年级的高班，经历红专辩论、学雷锋、九评学习、农村四清等等政治运动，既有不少“表现好”的学生入了党（例如我班毕业前党员比例高达50%），有的还成了政治辅导员，也陆续有一些“表现差”的学生跌入差质生的行列。

二、团、四分派是不是以优质生、差质生划线的？

有这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的因素。

我在《良知》一书中对团、四分派原因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主要有四条：

1.政治观点分歧：是主张红线主导还是彻底砸烂。

2.群体利益矛盾：优质生群体与各个时期特别是工作组时期形成的差质生群体在政治利益上是有矛盾的。

3.政治风险考量：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选择比较保险的一派。

4.道德价值差异：对某派某位头头，或者自己熟悉的某人的品德不认可而选择对立的一派。

还有其他很特殊很偶然的原因。

在团派中也有许多优质生，但大部分优质生在414。在414中有许多差质生，但大部分差质生在团派。这是有数据支持的客观事实。

这里的差质生，不只是指文革前，而是包括了七、八百在反工作组时期的蒯派。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文革前的优质生，而在反蒯时被打成反革命了，已是货真价实的差质生了。不过，他们很快被平反，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团总部的核心基本上就是由这批文革前的优质生、工作组时期的差质生（蒯派）组成的。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史海钩沉】

北京知青插队下乡部署运作内情

· 陈徒手 ·

—

1968年7月10日，北京市劳动局下属的安置办公室给市革委会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呈上一份汇报提纲，内中称1966、67、68年城区中学毕业生需要分配的共计25.8万人，其中1966年具备城市户口的中学毕业生有3万2千人需要分配，1967年有10.6万人等待分配，1968年分配人数则高达12万人。这一大批经历“文革”风雨的小将们闲置在城内，无法及时得到就业安排，无疑是酝酿矛盾的一个社会问题。毛泽东为此做了一个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这促使党内上下力争在短期内解决这个巨大难题。

中学毕业生是在学校分配还是离校回街道分配？1968年春夏之际，市安置办为此征求北京7中、25中、91中、125中、女12中、马甸中学等学校和崇文、朝阳、海淀三个区安置办公室的意见，两种意见交错上升，但都有一点共同担忧，就是如果回到社会上，这么多毕业生回到家里，双职工根本没有力量管教，将会影响社会治安，也容易学坏。而且受运动冲击，原来负责分配工作的各区劳动科已经暂停运转，街道办事处也一时陷于停顿，街道居委会也管不了这个工作，也管不了这些年轻气盛的毕业生。大家还是倾向于这三届毕业生继续留校，可在学校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待毕业分配。

在1968年新春中央批转黑龙江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后，北京市革委会就立即对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各学校军训团在五一以前，火速筹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掀起下乡上山的新热潮。4月25日至29日，各校思想动员，学

习老三篇、五七指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青年运动的方向》，在个人学习、小组讨论的基础上，筹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誓师会。5月4日召开《青年运动方向》发表二十九周年大会，请工农家长讲话、忆苦思甜，毕业生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等黑货。5月6日即进入“个人总结，群众评议”阶段，5月10日以后开始报名分配，欢送第一批响应祖国召唤的战友。（见市安置办1968年4月29日《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简报第二期》）

从工作简报第三、四、五期来看，5月份各学校的实际场景并不理想。崇文区第59中5月11日报告说，部分同学来校是为了打听分配方案，对学习班不感兴趣。学习班开始后，多数人学习不认真，讨论不发言，学生干部没有下乡上山的决心，怕让自己带头，没心思工作，少数学生对下乡上山有抵触。28中汇报称，一些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同学散布什么“生做北京人，死做北京鬼”“初中同学小，一骗去东北”的错误言论。尤其是很多工作干部把66年毕业生中拒绝合作的顽固分子说成“残渣余孽”，产生了畏难、急躁情绪。

市里再三强调要大造声势，每天反复播送毕业生的决心书，把学习班办成了斗私批修的战场，力争改变冷冷清清的场面，军训团长要掌握毕业生的活思想，坚决做到就地发现就地歼灭。同时希望家长支持自己的子女下乡上山的革命行动，学校要把学生、家长的思想状况及时通知各有关单位，相互配合工作。简报中描述道，各校工作干部白天办学习班，晚上家访，星期天再上门个别谈心，同社会各单位联系，摸到许多活思想，再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开好家庭斗私批修会。有的工作人员对在家里操持家务、守火炉的毕业生说，应离开家庭小火炉，到革命的大熔炉里，能炼得人红心红。

6月15日简报第七期呈现了喜人的信息，6月13日西城、石景山、东城、丰台等区赴东北方向的已走人数达2224人，全市准备出发的有一万多人。到了7月31日简报第十期，已是喜讯连连：“宣武区60中原来报名下乡上山的只有四五十人，通过学习最新指示，要求下乡上山到内蒙农村去的人数很快增加到二百多人，小将们自己组织起来到处宣传最新指示，还到家庭里去做家长的工作。68中从原来的十几个人，也迅速增加到160人。女七中从原来只有一个人报名，增加到90多人。”截止到7月27日的不完全统计，革命小将自愿报名去内蒙古的就有近一万三千人，而且报名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内蒙古各盟来京的同志正在迅速审批，已经审查批准三千多人。

10月4日刊发的第十四期简报称，截止到9月26日近两万名革命小将安全到达内蒙古草原和农村安家落户，有九个区县全都超额完成了任务，排在前三名的是西城区4003人、宣武区3432人、海淀区2505人。市安置办工作人员按捺不住，以“千里江河传捷报，万里长空舞东风”这么诗意的句子做为该期简报的大标题。

二

1968年初冬，继完成东北、内蒙古任务之后，北京市又掀起一个到山西安家落户的新高潮。11月7日市里刚刚布置完毕，各区各校就立即举办毛著学习讲用会、忆苦思甜会、斗争批修会和誓师大会，西城区召开有七千名学生参加的向毛主席献忠心大会，会后并组织游行，绕着中南海、西单一带大呼口号。全市有三万二千人报名赴山西，其中西城、东城区各占了九千多人，海淀、崇文区各占五千多人。

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重要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来一个动员”的最高指示立马翻起巨

澜，对城市各个角落的青年有一种催动的号召性魔力。据12月30日简报第十八期记载，市27中66届高三毕业生王建国过去说死了也不去农村，最新指示发表后，当夜十一点多就到驻校工宣队那里要求去农村插队。128中红革会副主任李惠兰表示不去工厂了，坚决要求去农村落户。福绥境街道26个居委会，就有259户705人报了名。海淀区提出到延安专区的知识青年要在元月5日争取走第一列车。山西晋东南来京接知识青年的干部们听到最新指示发表后，当夜打电话请示专区，要求多接收北京青年，他们原任务接2000人，结果他们接走了3000人。北京胶印厂工人连夜赶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印出六万五千张，准备赠送下乡知青。

在形成洪流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运动中，对领袖的无比热爱和信任无疑是最大的推动力。早在1968年6月11日首都下乡上山红卫兵战士大型集会上，44中徐晋湘作为赴东北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激昂表示：“向毛主席宣誓，时刻不忘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没有解放，时刻不忘帝国主义存在，时刻不忘支援世界革命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完全彻底地为世界人民服务。要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在世界东方建立起一个空前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去内蒙古的知青代表发言说：“同志们，战友们，战斗的号角吹起来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背起行装，踏上革命的征途，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火热的三大革命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为人民创新业立新功。”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在会上发言语重心长：“红卫兵的战斗光辉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两年来红卫兵的功绩和革命造反精神对我们永远是极大的激励。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不要忘记自己是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不要忘记在我们身上寄托着毛主席和首都亲人的期望。”在大会上通过了《向毛主席的致敬信》，把全场气氛升至高潮：“毛主席啊毛主席，在即将奔赴新的战斗岗位的前夕，在您的身旁，我们群情激昂，热血沸腾，蓝天作纸，四海为墨，也书写不完我们对您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1968年4月25日，市安置办请示市革委会计划组，拟定向每位下乡知青赠送一本新版毛主席语录和一枚市委定制的刻有“为人民立新功”的毛主席像章，以便下乡知青“经常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鞭策自己鼓舞自己，战胜困难坚定信心”。1969年1月13日，考虑到全市尚有三个年度的初、高中毕业生二十多万人，当年应届毕业生有17万人，市安置办致信市毛主席像章办公室，提出需要准备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各37万枚（本），请紧急给予安排生产，其中2月份10万枚，3月5万枚，4月份5万枚。

三

动员知青下乡的过程既繁琐复杂，又需庞大的经费开支，为了做好各项组织工作，市安置办经常发出经费使用的通知。譬如1968年5月23日市安置办通知各区，动员知识青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所需的宣传费用由市里拨给，按实走人数每人五角计算，开支范围包括各区组织的大会、租用礼堂、宣传印刷等费用。各区组织集体到火车站的车费及行李费由各区统一办理，知青本人起程当天乘电、汽车赴集合地点的费用可以报销，个人由家到集合地点如路途较远，其行李运输费也可统一由区里承担。凡经批准的革命知识青年，每人发给布票26尺，棉花票6斤，现金17元，由本人购制棉被一床。通知最后说，各区动员工作结束后，将所开支的各项费用列表报市安置办统一报销。

知青动员工作全市铺展之后，各项费用急速上升，造成市安置办名下的工作经费紧张，甚至一个时段无法周转。例如1968年5月23日，市安置办致信市革委会计划组，说1967年共动员二千一百余名逗留在京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虎坊路接济站作

为承办单位，垫支路费四万四千三十八元四角正，需请市里速拨归还，以便结帐。再则，1968年初夏时，北京市实际动员一万六千多知青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按照双方事先约定，由兵团拨给北京知青每人安置费50元，解决棉被、火车票、托运行李、短途运输及宣传费等，费用共计80万元，暂由北京市垫付。8月22日市安置办向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写信，说目前北京正在开展去内蒙古插队的动员工作，任务急迫，现在没有了周转的资金，望你兵团见信后速将80万元汇来。等待数天后，还是未见款项电汇，焦急万分，8月30日市安置办只得派人到邮局大楼，给黑龙江兵团发去一封加急电报：“前去信谅已收，所欠安置费望见电速汇京。”

更大困扰的事情是为数万名下乡知青解决过冬衣装，这成了市安置办几年间上下周旋、费心费力的重点工作之一。1968年6月，内蒙古接收北京14373名中学毕业生，其中农区11600名，牧区2773名。双方商定，去牧区的服装由内蒙古解决，北京则负责去农区一万一千多套的服装加工事宜。经过测算，每套服装平均使用棉布34尺，棉花5斤，金额19元，总棉布需696000市尺，棉花127600市斤。从7月5日起到8月15日，市服装总店需分三批交货，每批交货按男女比例（男占35%，女占65%），青、兰两色，青年样式，数量不少于三千套。9月9日，北京又有三千多毕业生赴内蒙古，市安置办上报市革委会计划组，要求在9月25日前赶制棉上衣1600件、棉裤3000条。

进入1968年11月，冬装的供应工作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按中央规定，山西不属高寒地区，没有寒衣补助。但市安置办认为，山西省北部靠近内蒙古，气候较冷，有的在寒衣方面确有实际困难。市革委会财贸组经研究后，同意拨给部分布票、棉花票和人民币。

市财贸组确定了“困难的补助、不困难的不补助”的原则，不得将布票、棉花票和人民币绝对平均分发，而且家长系在职职工者，属于经济困难的毕业生由学校向家长所在单位联系，解决部分钱款，布票、棉花票由安置部门酌情给予补助。根据天气渐变的幅度，确定雁北22尺布票，4·5斤棉花票，人民币11元；忻专、晋中20尺布票，4斤棉花票、人民币10元；晋南、晋东南18布票、3·5斤棉花票、人民币9元。计算棉布单价应以平面布为准，棉花以市场供应的普通棉花单价为准。市安置办强硬规定一条，上山青年领到困难补助后，因某种原因未去或已到达安置地区工作不满六个月又回京者，一律追回补贴票证或追退实物。（见市安置办致各区革委会1968年11月25日《关于组织动员中学毕业生去山西插队寒衣困难补助的通知》）

截止1968年12月20日止，陕西已接受约三万五千名北京知青安家落户，但陕西不属高寒地区，依规定没有棉服、棉被补助。有相当一部分人出发时因家中困难没有携带棉服、棉被，市安置办提议，从机动布、棉票指标中予以解决，经费补助由陕西和北京市各解决一半。原来计划平均棉布补助每人15尺，各校革委会、部分师生反映过低，可适当增加到20尺，平均每人棉花4斤，款10元。计算后，三万五千人共需棉70万市尺，棉花14万斤，款35万元（北京市负责17万5千元）。市安置办张德贤找市财政局业务小组李金昌面商，李金昌表示原则同意安置办意见，但还应本着节约开支的精神严格控制，分清情况分别解决，缺少棉花、布的就不一定解决钱，学生父母是在职工，能由单位补助解决的，就不予补助。

四

1969年初，中央安置办在跨省区安置协作会议上作出决定：东北、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在北京市接收革命小将，有关冬装制做事宜由北京市承担。会上确定的指标是，东北制做

棉服8万套、大衣8万件，内蒙兵团制做棉服1·5万套。兵团建议棉服的质量要高一点，最好是大衣线卡叽，如实在无货源，草绿色平纹布也可，棉花质量也要高。

应北京市革委会的请求，黑龙江省同意在1969年6月开始接收北京市知识青年九万人，其中生产建设兵团七万、插队二万。九万套棉服需要在北京制做，布票中央拨给，款项由黑龙江省支付。黑龙江当即寄来服装样品，商议面料用草绿色斜纹布。

北京市服装鞋帽公司所属各厂负责生产这批棉服，新衣装分两批入广渠东路的公司仓库，市安置办于1969年5月26日派人将冬装出库的印鉴底付上，出库时凭此印鉴戳即可付货。第一批入库男棉服上下衣22500套，其中特号45套，一号30%含6750套，二号59·8%含13455套，三号82%含1845套。女棉服上下衣27500套，一号40%含1100套，二号55%含15125套，三号5%含1375套。

发往东北、内蒙古的十一万套棉服、九万五千套大衣原订九月底交货（少量大衣十月上旬完成），1969年6月23日市安置办紧急致信市商业局、二轻局、纺织品公司、服装鞋帽公司等革委会，认为九月底交货与市里的精神有些距离，要求提前至九月上旬完成，以利各地分配工作按期完成。9月27日，市安置办工作人员又手写一封信给纺织品公司革委会，说所需的材料大部分已落实，但尚缺大衣面12万5千米、绿斜纹布面17万5千米、长毛绒3千5百米、大衣领3千5百米。这些缺额颇令安置办工作人员焦虑，四处奔走，以求得冬季来临之前能把棉服分发到东北、内蒙古兵团、各县（盟）的知青点。

1969年初，吉林、河北省革委会决定接受北京市七万五千名知识青年，市安置办又为此忙碌一阵，与各部门来回交涉。吉林属于高寒地区，北京市需向中央申请棉布、棉花的高寒供应指标。而河北不能享受高寒的补助，五万人的寒衣只能从北京市机动布、棉花票中解决。这样共需棉布二百五十万尺、棉花四十七万五千斤，这么庞大的数量也让北京计划、物资部门筹措万分艰辛。1969年初春，市安置办与云南来京工作组商定，为应对当地的气候条件，需供应北京赴云南的支边青年每人一套蚊帐和凉席。市安置办派人设法购置了蚊帐一万顶，5月2日已分两批由北京托运到昆明。但是在从四川产地订制、调运一万条凉席时，铁道部和北京铁路局均不同意从北京转运，认为交叉托运，浪费往返运力，市安置办只得让四川省泸县日杂经理部把万条凉席直接运至昆明。

1969年初夏，市财政局拨付二百万元，让市安置办做工作周转之用。到了8月中旬这笔钱已用完，黑龙江、内蒙古兵团却迟迟未按协定归还这笔垫用款，安置办只能再向市财政局申请三百万元，以解决急需用款。8月19日市安置办给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钟奇打报告，汇报这么一个现象，即各区不断反映一些毕业生家庭经济困难，家中两三个人盖一床被子，而且最近两年很多家庭去边疆两三个毕业生，家中已没有布票做被褥。统计各区报来的数字，全市类似这样的情况大约有九千人，共需要布票18万尺。北京市从中央拨给北京知青的布票补助指标中，每人约节余5尺左右。市安置办建议，对于被褥确有困难者，布票从内部节余中给予安排，但钱款仍需由学生家长自行解决。

从1968年底开始，北京市尝试由九个郊区县就近接收城内八千知青，需要安置费二百万元，市革委会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对此批示，报请国务院批准拨出该款。中央粮食部曾下发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条规定，其中有下乡青年参加农业生产，从到达后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止，按照他们所在的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由粮食部门从统购销粮中安排供应。市安置办干部在走访中发现，下乡青年刚参加劳动，吃粮增加，生活上都还没有基础，自己也无法调剂，即使补足到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也还会有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因此安置办参照兄弟省市的处理办法，想了一个变通的过

渡办法，就是下乡青年一年内每人每月按40—45斤商品粮，由县粮食部门供应，一年后再改按当地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由社、队供应。

1969年初春以后，从北京站频频开出知青专列，每开出一个专列都需要20—30名干部登车护送，以便沿途做教育和组织工作，把下乡青年顺利地送到目的地。最初几趟专列的护送人员差旅费由接收地区报销，后来接收地就找借口不予负责，只得回北京找原单位报销票据，慢慢地有的学校经费有限，承担不了每人往返车费一百多元的开支。市安置办提议由市财政局分别向各区拨一项护送人员差旅费专用款，市财政局回复说，此笔费用还是在护送干部所在单位经费内报销，如此项开支较多，单位经费超支，年终时财政局可给予适当补助。

1969年底结算财务，市安置办焦急地给各省区寄发催款信，悲情诉说，力争办公经费早日回笼。69年度黑龙江省共接收北京市知识青年70695人，其中去兵团的68778人，去农场的1897人，去插队的20人，所有人的火车票、行李票、途中餐费、服装费、包装托运费、护送干部车费合计四百二十八万五千多元。中央早已把相关钱款拨付给各接收省份，这些费用按理应由黑龙江省支付，但是黑龙江省不知何故只汇来一百万元，北京市安置办只能苦苦央求归还剩余的三百二十八万元。

五

截止1969年底止，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四十三万人，其中，农村插队二十九万八千人，兵团、农场十三万二千人，还有本市郊区一万人。安置大致完毕后，市安置办就忙着派人组团参加有关省市举办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代表家乡父老慰问当地的北京知青，赠送《毛泽东思想万岁》等书刊，并带上电影放映机、放映员，巡回展映影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珍宝岛不容侵犯》和《地道战》。

1974年6月，根据中央21号、30号文件的精神，市委做出了《关于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以负责到底的精神关心到兄弟省区去的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配合当地共同做好工作，并要主动地、有计划有重点地支援那里发展生产”。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提出，“每年由我市拿出千八百万的物资支援到外省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发展所在地区的生产”。为此，市革委会主管财贸的负责人万里、王磊等人开了一个碰头会，商定由市财政拿出一千万元物资“支援我市到外省的下乡青年”，并召开有关工业局布置汽车、生活、医药等物资落实措施。

属于农林口支援的物资有手扶拖拉机二百台、柴油机三十台、水泵一百台（其中深水泵五十台），这些物资本身就是紧缺产品，像化肥指标尤其少，农林口难免有些意见，对此王磊6月15日在申请报告中用铅笔做批示，安抚道：“满足他们好了，我们自己克服一下困难，如何？”

1974年8月26日，市安置办在致市委“做好对外省区的物资支援工作”请示报告中称，截止到目前，已落实了马列主义书籍、手扶拖拉机、柴油机、农业泵、130汽车、三轮摩托车、缝纫机、医疗器械等产品，共四百七十六万五千元，为计划总数的43%。但还有六百三十余万元的物资（占计划总数的57%）尚未落实，原计划中有些物资是短线产品，如化肥、建筑材料、农机配件、汽车配件等约合四百九十多万元，占计划总数的44%，目前这类产品供不应求，难以再拿出来支援外地。市安置办准备调换为外地需用，本市又能增产、有存货的物资，譬如手扶拖拉机、130汽车、缝纫机、四级交流电动机、磨

床、铣台及各种小型农业机械，无偿支援的重点是插队地区和北京青年先进点，以此“鼓励在兄弟省区上山下乡的北京青年坚持乡村，帮助他们和当地贫下中农一道发展生产”。

9月7日，王磊主持召开了检查、落实支援外地下乡青年物资会议，农机局、物资局、一商局等代表在会上谈到一些困难。农机局计划增加的四百一十五万元的物资中，只落实八十六万元，计划增加的手扶拖拉机400台，农机局只同意给200台，王磊只能含糊地表达道：“本市少留二百台是可以过去的，支援外地二百台不要少。”物资局计划增加的一百二十万元的物资中，原拟增加的电动机980台，一台也没有了，30辆130型汽车一时定下来。市安置办在会上恳请物资局从超产的汽车中再支援130型汽车30辆，北京吉普车30辆，共八十七万元。（见市安置办1974年10月5日致谢静宜、王磊《关于增加支援外省区物资的请示》）

130型汽车单价一万五千元，1974年上半年无偿拨出60辆给黑龙江、内蒙古、陕西、山西等省区，其中一辆特别指定给陕西延川县关家庄孙立哲知青医疗点。北京知名知青董良翻给市里写信，告自己所在的大队离城市远，医疗条件差，一些危急病人不能及时送出，农大在村里搞开门办学，师生需往返，请求支持212型吉普车一辆，市革委会领导当即同意拨给。在化肥供应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市革委会力排众议，特批150吨化肥，给侯隽、邢燕子、董良翻三位北京著名知青模范所在的大队各50吨，禁不住议论纷纷，主事者也答应今后一般不再安排了。

市里指示，解放鞋、毛巾、肥皂、洗衣粉、茶缸、日记本、卫生纸都要制制作八万套，有计划地赠送给下乡的北京知青。而60元的半导体收音机要生产三千台，140元的缝纫机造出三百架，尽可能分配到北京知青的聚集点。有领导甚至出主意，可为北京知青点准备一万套理发工具，里面需配置推子、梳子、抄子、掸子等。

各地知青办纷纷下发文件，要求北京市支援的物品、药品器械一律发至北京知青的下乡点，防止中途克扣和丢失，集体使用，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私自占用，知青招工、升学、参军、结婚离点时不得带走或变卖。当时上海、天津等市也是以物品无偿支援来搞好有关省区的关系，增强知青的感情关联和慰问作用，相比之下，北京的物品较为丰富，数目比较大，受当地欢迎的程度也高。譬如1974年11月15日山西省知青办有关物资分发的一份文件显示，天津赠送的书籍有一万九千册，而北京市同期赠送的领袖著作、批林批孔材料和农业科学技术书籍则高达八万九千二百册。

1975年6月6日，市安置办向市委上交了一份七四年度支援兄弟省区北京下乡青年物资工作的情况报告，内中称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支援物资已于2月底全部运往有关省区，其中拖拉机、农业机械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480万元，汽车、机床和机电设备208万元，医药、医疗器械、缝纫机、收音机等185万元。

报告中遗憾地提到一笔，就是因运输方式粗糙，支援延安地区下乡青年的五十台碾米机，砸坏了四十五台，有四十台成了废铁；二十台水泵的滴水孔和出气孔胶木活塞全部砸掉，四台扬场机，有三台砸坏铁轮或轴架，还丢失一台喷雾器。

市里几位领导在报告中用红笔打感叹号和问号，不胜唏嘘。

□ 原载广州《随笔》2018年第六期

~~~~~

【书刊评论】

知青将以什么样的形象留给后人？

• 定宜庄 •

《中国知青史》，包括我写的“初澜”和刘小萌写的“大潮”两部，初版于1998年。弹指间11年过去，这一代人也从四十多岁的中年逐步进入老年，无论是个人的心境，还是在社会上的影响，都已盛况不再。人们心里都明白，知青这代人从历史舞台上退出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尽管任何一代人，最终都会有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但是在行将谢幕的时候，对自己作一番梳理，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留给后人的形象究竟是什么，我想还是必要的。这也是我愿意将这套《知青史》一书再版的原因。

不是随便哪一代人都会从“代”的角度来关照和思考这个问题的，虽然每一代人都会有一代人的问题，都会有由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造成的困惑、坎坷和痛苦，但一般地说，处于不同阶级、不同环境的人，处境和记忆往往迥然有别，他们留给后人的，往往具有更多个人的或仅仅属于那个特定阶级、特定群体的色彩，后人包括历史学家，也往往是从这些不同的个人和群体，来分别地认识和评判他们，然后再从整体上来看那个时代的。但知青一代不同。

知青的共同经历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他们作为“知识青年”的所谓“知识”的由来。他们完完全全是在那个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下成长起来的。有关17年教育，学者们做过各种各样的总结与反思，结论固然是有褒有贬，但有些特点是为世所公认的，那就是教育的一致性、一元性，从办学体制上说，不再有民办、私立等各种办学形式存在，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从教学内容上说，受到严格控制，不允许任何所谓“封资修”的东西进入。于是所有的学生，都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他们习惯以一个群体而不是以自己个人的方式思考和表达。第二是他们有过共同的知青经历，这突出地表现在“文革”十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当“文革”爆发之前存在于中学生中的一切鸿沟和差距，诸如城市与农村之间、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之间、高干子弟与平民子女之间、优秀学生与落后分子之间，以及“文革”时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等，都在顷刻之间烟消云散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知青。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的一致现象，的确为其他任何一代人所未曾体验与经历，知青们也便因此而具有一种认同感。张口闭口动辄就说“我们这代人”，也是在其他中间很少出现的现象。

知青一代的整体形象问题就是这样产生了，这当然不是小事，在我看来，它关乎的是这一代人在经历了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之后，对于这个群体因此而导致的伤害和缺陷是否有所思考，有所反省，是否能够将自己认真严肃的思考和反省留给下一代，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再在我们的土地上、在我们的子孙后代身上重演的大问题。

这里涉及的问题其实有三个，第一个是对这场运动的评价。

迄今为止仍有当年的知青典型在拼命叫嚷对这场运动不能否定，由于年轻一代对那段历史缺乏常识，这种声音势必会造成年轻一代思想认识上的某种混乱。而我们认为，这项政策的出台与新中国成立后特殊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都紧密相关，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尤其是以计划经济的背景来看待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仍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悲剧，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也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尤其要强调的是，这项政策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老三届”及其前后的1

700万城镇知青和他们的家庭，还涉及到与他们同时代的、比他们的人数多出不止一倍的农村回乡知青，而且涉及程度之广之深，绝不亚于城镇学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知青看作是整个人的一代人，而不仅仅是其中家居城市的那一小部分。也正因如此，这场悲剧的含义才远远超出了“老三届”悲欢离合的故事。

第二个问题，是知青能否正视和总结这场悲剧给自己带来的教训。

经历了特殊的知青岁月的这代人，具有比上一代以及下一代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艰苦生活的磨炼，他们有对基层社会和民众的了解，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了这杯酒，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他们既然比其他代的人吃过更多的苦，便理应比其他代人更优秀，他们期待着“劫后辉煌”，这便是“青春无悔”这个口号能够喊出来的背景，也是下一代人批评我们这代人“自恋”、“神圣化”的原因。而事实上，所谓的“劫后辉煌”，只是安慰自己的一个神话而已。“劫”本身就意味着毁灭，如果劫后还有辉煌，那他遭遇的就不是真正的劫了，苦难这杯酒，更不是能够化解生活中一切难题的灵丹妙药，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如此急剧的这几十年。这代人在理当读书求学的年龄被送到偏远贫瘠的山乡去接受“再教育”，在教育上、在人格的形成上造成的缺失无法弥补，导致他们回城后对急速发展的社会难以适应，也导致社会上各个领域尤其是科研文化等领域上出现严重的断层。这种缺陷还直接影响到知青的下一代，这些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延续，还会不断地暴露出来。

十多年前我曾经期待，随着知青一代人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对自己那段人生经历的反省会不断深化，但现状却令人遗憾，原因主要是客观的，但也不能排除主观因素。知青中的大多数人对往事留下的只是回忆，而不是思考，即使思考，很多也还停留在十多年前的认识上，尽管“青春无悔”的口号已经很少有人再喊。

这就要提到第三个问题了，那就是我们是不是也该想一想，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形象留给后人？有人说，砍掉历史就是砍掉未来，这话发人警醒。如今这代人正在逐渐走向人生的边缘，不是已经有很多人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态度，甚至宁愿将其故意遗忘么？

我半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深深体会到任何一段史实、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无论当时的影响多大，如果没有被讲述、被记录，就进入不了历史，就终有被遗忘的可能。尽量真实客观地记录下那段历史，记录下这一上山下乡措施给一代人带来的创痛，是作为一个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写这部书的愿望就是，但愿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但愿我们的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更有人性、更有尊严、也更有文化的社会中。

（作者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 原载《北京日报》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